

美国人 与 中国共产党人



〔美〕肯尼思·休梅克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美国人与 中国共产党人

〔美〕肯尼思·休梅克著
郑志宁黄际英高二音简 明译

吉林文史出版社

MEI GUO REN YU ZHONG GUO GONG CHAN
DANG REN

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

责任编辑：田虎

封面设计：姜天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125印张 5插页 245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印数：1—4000册 定价：5.1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7-80528-139-4/K·66

Kenneth E. Shewmak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 1927-1945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and London 1971

据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译出

译者序

自1927年以来的长时期中，美国官方对华外交的主要目标始终是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而中国的共产党活动却以其日益加重的神秘感，成为美国民间的热门话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及其驻华外交和军事机构出于对日战略的需要，曾同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政权保持了一种虽不那么密切，却颇为友善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东西方之间“冷战”局面的形成，特别是由于美国政府实行了片面支持国民党的“扶蒋反共”政策，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急剧恶化。随着1949年蒋介石政权的垮台，美国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势力被清除。美国政界对“美国何以失去了中国”的反省，成为“麦卡锡主义”出现的一个重要诱因。朝鲜战争的爆发则加速了“麦卡锡时期”的形成。在这个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J·R·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的名字命名、长达4年零10个月(1950年2月—1954年12月)之久的美国政治反动时期中，大批与中国共产党人有过接触的美国作家、记者、军人甚至政府官员，都被指控“涉嫌”参与所谓“亲共和反美活动”而遭到非法的调查、审讯和迫害。“国际共产主义阴谋”论喧嚣一时。虽然麦卡锡的指控因毫无事实根据而难以成立，麦卡锡本人也因其带有强烈诽谤性和破坏性的政治投机活动最终发展到危及美国资产阶级赖以立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传统，而被美国最高统治集团所抛弃，但是，对它的余悸和美中两国之间的隔绝与对立，仍然使人们很少去冷静地

研究中国的共产党问题。60年代以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共产党中国和中国的共产党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敏感而神秘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了。人们既然要了解作为一种政治现实的共产党中国，就不能不去了解历史上的中国共产党人，因而也就不能不对当年那些美国实地考察者们的著述和报道进行研究，并重新作出评价。休梅克的这本书就是这种意向和努力的一部分。

作者在对该书的写作中，采取了一种超然的、客观主义的立场，运用文化人类学、心理分析和比较研究等方法，具体地记录了1927年至1945年间中国国内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国共两党的重要政策、两党不同的政治理论信仰、意识形态和国共关系、美中关系、中共与苏联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旁及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考察者的个人经历，并通过这些亲历者的口和笔，对国共双方许多上层领袖人物的个性特点、言谈举止和某些生活细节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使本书成为一本兼有学术性、资料性和趣味性的著作。

当年对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过实地考察的西方人在向外界进行报道时，同样是采取了一种“纯客观主义”的态度。惟因其是客观的，所以也是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国共两党之间腐败与进步的强烈对比，人们从中不难看到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必然性。诚然，象每个人都无法保证自己的认识具有完全的客观真理性一样，我们也不能用那样的标准来要求作者。对于书中的所述所论，无论其属于实地考察者还是属于本书作者，读者都会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各自的结论。

作者在原书的后面，曾附有一个参考书目，因其中绝大部分均已见诸各章后注，以故略去，仅保留了它的说明部分，作为判断这些著述价值的参考。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东北师范大学外语系戎逸伦教授的竭诚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译者

1988年3月

目 录

引言	(1)
----------	-------

第一部分 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 报道1927—1936.....	(7)
--	-------

1. 封锁之前：1927.....	(8)
-------------------	-------

2. 从革命者到土匪：1928—1936.....	(16)
---------------------------	--------

3. 众说纷纭的残锁论：1931—1936.....	(29)
----------------------------	--------

第二部分 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 1936—1945.....	(39)
-------------------------------------	--------

4. 残匪论的破产：1936—1937.....	(40)
--------------------------	--------

5. “冲破封锁的冒险者”：1937.....	(56)
-------------------------	--------

6. 敞开的大门：1937—1938.....	(71)
-------------------------	--------

7. 关闭大门：1939.....	(94)
-------------------	--------

8. 重施新闻封锁：1939—1944.....	(107)
--------------------------	---------

9. 新闻检查制度：1937—1944.....	(121)
--------------------------	---------

10. 赴西北记者团：1944—1945.....	(136)
---------------------------	---------

第三部分 形象与现实：西方文献中的中 国共产党人.....	(157)
----------------------------------	---------

11. 出类拔萃的人.....	(158)
-----------------	---------

12. 穿草鞋的勇士	(166)
13. “五无的地域”	(173)
14. 不安定事业中的忠实伙伴	(190)
15. 他们是莫斯科的宠儿吗?	(200)
16. 他们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吗?	(210)
17. 形象	(233)
第四部分 令人信服的交往	(237)
18. 阴谋论	(238)
19. 美国人的看法	(265)
20. 中国人的看法	(286)
21. 两种时代	(300)
参考书目说明	(312)

引言

本书所研究的，是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最初交往的情况。如今，这一类历史探究尽管已经越来越常见，但却尚未有一个恰当的名称。可以称之为外交史学，但它和外交史学家们对各国外交政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传统的关注，却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也可以称之为理性史学，但它更集中探讨的又是假定、想象、感觉等一类问题，而不是思想观念。应当说，它既是外交史学——试图叙述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交往，也是理性史学——试图掌握作为这种相互作用基础的不同价值观念体系。中美关系包括美国人和中国人个人之间所有的直接和间接的交往。所谓国际关系，如阿基拉·艾里耶所说：“如果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它就根本不存在。”

也许艾里耶最精辟地阐述了这种新型的双重文化历史探究的性质和目的。他说：“所有的外交史都是用连字号连接的历史。”但是，为了对理解美国——东亚关系作出有意义的贡献，学术研究应当用“不止一个连字号来连接。”它应该是“外交——理智——心理史。”只有把美中关系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理性交流问题，我们才有可能把自己从昔日的重压下解放出来，期待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

艾里耶关于外交关系应首先被看作是一个理性问题的建议，似乎尤其适合于研究那些在1937年到1945年间与中国共产党人直接交往过的美国人的经历及其文章。25年来，中共与美国之间始终处于一种敌对和相互指责的紧张状态。在这种背景下，有些人

很难想象中共——美国关系曾经是另一种情况。但是，在1937——1945年间，中共——美国关系确曾是另一种情况。那是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是中日战争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的年代。外部的入侵暂时阻止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在战场上的较量。日本人的扩张也暂时允许美国人把中国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看作是世界范围的捍卫自由和自决斗争中的盟友。

从1937年到1944年，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没有官方接触。在蒋介石同意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赴延安之前，美国国务院外事处的官员们不得不主要根据二手资料去估价中国的共产主义。美军观察组的第一批人员，直到1944年7月22日才到达中国的共产党地区。此后不久，由帕特里克·J·赫尔利执行的对华政策在使中共同美国疏远方面获得了成功。到了1945年7月，中共公开谴责赫尔利和美国的其他“帝国主义分子”片面支持国民党一方。中共——美国关系从此呈现出一种敌对和排斥的状态，并一直持续至今。乔纳森·米尔斯基指出，自1949年以来，“除了埃德加·斯诺以外，没有任何美国人在人民中国广泛旅行并写出关于它的作品。”那些在1945年以前曾经到过延安的美国人所认识的，是一个和现在不同的共产主义中国，它对于美国有着一一种合乎情理的好感。

最先到红色中国去的美国访问者们既不是外交家，也不是政府的其他官员。他们中大多数是记者，而其余的是商人、医生、教育工作者、军事观察家、传教士，甚至还有一位家庭主妇。他们的身份虽然各不相同，但却几乎毫无例外地带着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赞美之词，容光焕发地从延安返回。尽管这一点今天看来似乎奇怪，但是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给美国人留下的印象就象美国人留给他们的——一样深。

虽然本书集中写的是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我仍然试图展现西方评价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横断面。因此，对于曾同中国共产党人有过直接交往的欧洲人，我也给予了很大的重视。他们的考察结果为人们展示了可供比较和对照的资料，因而是有益而重要的。但是，因为在战争和人类苦难岁月中到中国共产党地区旅行的大多数外国人是美国人，所以这本书实际上写的是他们的故事。

任何一个有意探讨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关系的人都会遇到某些困难，其中最大的恐怕是这个题目本身所具有的争议性。罗斯·Y·凯恩在1960年曾经说过：“美国对华政策在其国内政治方面的卷入，深于美国在华外交事务中的任何其它方面。”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主义在美国成了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共和党外交政策发言人阿瑟·H·范登堡参议员把中国排除在美国两党合作的范围之外。他撰文抨击关于“出卖”蒋介石的“中国‘罪行’”，并毅然与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和哈里·S·杜鲁门总统的远东计划分道扬镳。尽管范登堡参议员知道向后看和发出谴责是相当容易的，但他本人却“不倾向于过份地那样做。”然而，等到具体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时，范登堡的一些同事——首当其冲的是约瑟夫·R·麦卡锡参议员——却不很克制。其结果，就是本书中出现的许多人成了50年代反共讨伐运动的主要目标。

虽然50年代那种强烈的感情主义已经消退，但是，美国人同中国共产党人交往这个题目仍然会使人联想到邪恶的阴谋和猖獗一时的反美主义。象安东尼·库比克一类的右翼历史学家仍在美国公众面前竭力坚持过去的错误。当代记者偶尔会发现，美国在越南的卷入与它早年在战时中国的经历有某些相似之处。例如李·霍尔认为，美国驻越南军事人员的“顾问”称号，“可能

是自中国共产党人被称为‘土地改革者’以来最不准确的提法了。”可见，本书所研究的题目仍是一个既有争议又十分敏感的问题。在我潜心研究国务院档案时，一位和蔼可亲的官员随便询问了一下我的这个研究项目的性质。我回答说，我对美国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报道这个问题感兴趣。这位官员立刻作出反响：“哦，天哪！”从中不难看出人们对于美国人在红色中国的经历迄今是个什么情况这样一个探究论题可能抱有的态度。

第二个困难与第一个有关联。人们也许会根据50年代的那种司空见惯、使人眼花缭乱的指控与反指控的情况，认为美国人一贯深切关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据调查，整个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实际上只有极少数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有比较充分的了解。此外，这些年来有关中国共产主义的消息报道几乎没有上过报纸的头版。当今的渲染使过去的史实面目全非，所以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历史事件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去考察了解。一开始就应该认识到这一点，那种事后的聪明已经把我们对于美国人在红色中国的经历这一问题的认识引上了歧路。直到最近，中国共产党人才在美国公众舆论中赢得了一定程度的声望。尽管中国共产党到1945年已经脱离了隐匿的状态，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政党，但相对说来，人们在抗日战争结束时对他们的情况仍近乎一无所知。人们提起中国的时候，多半只会想到蒋介石总司令，他那有魅力的夫人以及飞虎队。正如陈纳德（克莱尔·谢诺尔特）将军的飞虎队里一位随军教士所回忆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这就是人们认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必须考虑的历史背景。

第三个问题是有关词义方面的。我在本书中大量使用了美国的报道文献中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经常使用的一些术语，这可能会使本书的读者在理解上出现困难。例如“红色”，它在使用于中国

红军 (Chinese Red Army or chinese Reds) 这样的名称上时，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虽然也有一些前去采访的考察者使用这个词时用的是贬义，但其他人如埃德加·斯诺则不是这样。人民中国的一首流行歌曲中有“红色是美好的”这样的句子。作者在使用这个表示色彩的词时，一般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红色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中国，以及边区这些名称，也在书中交替使用。鉴于共产党的统治在1945年以前没有扩展到整个中国，这些名称即是指那些在一定时期内由共产党控制的农村地区。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词的缩写，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经常指的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人。众所周知，1937年以后，红军改称为八路军，或第十八集团军，或取其音译PaLuchun。本书仅限于两个最常见的用法，即红军和八路军。“新闻管制”和“新闻封锁”两个词不能只从字面上去理解。它们是指事物的一种具体状态，其特征分别是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和禁止外国人到某些受限制的场所去。但是应当看到，在1937—194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共产党根据地实际上已经被一个以大量碉堡和稠密的警戒哨卡构成的真正的军事屏障完全封闭了。此外，我还以不同的含义使用了“reporters”和“reporting”两个词。“reporter”所指的或是某一位复述者，或是受某新闻机构派遣前去收集情报并定期写出报道的人。“reporting”则主要指职业记者完成的作品。更广义地说，它还包括某个特定人物所写的那些已出版或未出版的记述，这些东西都向人们提供了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资料。我希望这些词的各种含义能在上下文中显得清楚了。

任何一本书在组织和编排上都可能遇到困难，本书也不例外。第一部分为1937年以前外国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报道作了一个背景式的概述，试图用历史的观点正确说明本书的主题，但并未追求详尽无遗。对这一时期极少的几个人——如艾格尼丝·

史沫特莱——作了比较详细的描写，因为他们的作品后来很重要。第二部分是对1936年到1945年间外国人同中国共产党人直接交往情况的历史性综述。尽管我在这一部分主要回答的是谁和什么时候同共产党人会面的问题，但还是简短地描述了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有影响的文字产品，并介绍了当时这些作品得到的反应。第三部分以专题的形式更深入地讨论这些作品，特别讨论了有关“土地改革者”的神话。最后一部分从整体上论述美国人在红色中国的经历，集中回答了为什么当时西方人会对中国共产党人作出那种反应，并且试图提出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进行交往的某些方式。

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一个永不失其魅力的课题。原因何在？一位作家推测说，中美关系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异性相吸”。查阅了至少是1937年到1945年间有关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直接史往的文献后，得到的却是一个相反的结论。通过分析当年那些与中国共产党人有过交往的旅行者们的文章，我想弄懂为什么美国人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并想看到他们的理解与现实有多大距离。

为中美关系史上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提供一个公正而有条理的说明，为当时发生的事件和人们做出的行动提供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就是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

第一部分

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报道

1927——1936

1. 封锁之前：1927

1927年4月12日清晨，国民党突然撕毁它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协议，开始在上海大批地捕杀共产党人。实际上，国共两党从1923年到1927年间所建立的是一种不稳定的联盟，比一场各谋实利的婚姻强不了多少。在此期间，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中国共产党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组织机构。蒋介石在1927年制造的白色恐怖暴露了他的真面目，并由此开始了一场把中国拖入血泊的内战，直到1937年。这种由上海军事政变引起的彼此疑忌，其后遗症一直没有消除。只是当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把国民党赶出大陆之后，和平才得以重新降临中国。

在1927年以前，外国人眼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西方考察者中极少有人意识到即将发生的分裂，而美国人则普遍认为国民党处在共产主义强有力的影响之下。^{〔1〕}再者，苏联确实一直是国民党的靠山，为其提供军事顾问和经济援助。国民党甚至还被接纳为共产国际成员，参与其事务。因此，在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决裂之前，西方对于中国国民运动的怀疑是很自然的事情。^{〔2〕}当蒋介石转而背叛了其往日的合作者的时候，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才解除了这种怀疑。^{〔3〕}

解散了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以后，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了一个政府，与先已在汉口建立的国民党左翼政权相对抗。所谓的武汉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和汪精卫领导下的国民党自由派所组成的联盟。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加强同国民党左翼的合作来顶